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雨潤衡

8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猪骨
李家村
柳村
南村
北村
西村
东村

論衡

8



主編
黃寬重

副主編
袁國華 祝平一 王道還

編輯
李建民 陳維鈞 陳熙遠

編輯助理
李昌菁 蘇彥榮 吳燕翎
林宛蓉 謝佩霓 賴昭吟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八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出版

本期定價 新臺幣190元

美術構成：王道還

印 刷 者：加 斌 印 刷 廠
TEL:(02)-23253077
FAX:(02)-23258449

國內總經銷：
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02)-26422629

國外經銷及長期訂戶（含學生優惠）：
樂學書局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10樓之一
e-mail : Lexis@ms6.hinet.net
電 話：(02)-23219033

目錄

文獻輯存

2	杜正勝	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
10	馬思中·陳星燦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
18	吳銘能	臺靜農先生珍藏陳獨秀手札的文獻價值

學思歷程

42	邢義田	行役尙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	-----	-----------------------

田野工作

63	闔正宗	「日據時代佛教各宗派寺院的分佈及現況調查」報告書
65	闔正宗	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
91	闔正宗	台灣觀音道場的建寺傳奇初探
104	闔正宗	台灣日據時代日本曹洞宗佈教年表及戰後交流資料
113	闔正宗	有關「曹洞宗大本山台灣別院」資料

學術思潮

117	胡文輝	陳寅恪詩箋釋二題
-----	-----	----------

研究討論

130	王俊中	中古佛教醫學幾點論題芻議—— 以「四大」和「病因說」為主
144	李永迪	談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一件銅鑑及其相關問題

目錄

文獻輯存

- | | | |
|----|---------|------------------------------------|
| 2 | 杜正勝 | 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 |
| 10 | 馬思中·陳星燦 |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 |
| 18 | 吳銘能 | 臺靜農先生珍藏陳獨秀手札的文獻價值 |

學思歷程

- | | | |
|----|-----|-----------------------|
| 42 | 邢義田 | 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
|----|-----|-----------------------|

田野工作

- | | | |
|-----|-----|--------------------------|
| 63 | 闡正宗 | 「日據時代佛教各宗派寺院的分佈及現況調查」報告書 |
| 65 | 闡正宗 | 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 |
| 91 | 闡正宗 | 台灣觀音道場的建寺傳奇初探 |
| 104 | 闡正宗 | 台灣日據時代日本曹洞宗佈教年表及戰後交流資料 |
| 113 | 闡正宗 | 有關「曹洞宗大本山台灣別院」資料 |

學術思潮

- | | | |
|-----|-----|----------|
| 117 | 胡文輝 | 陳寅恪詩箋釋二題 |
|-----|-----|----------|

研究討論

- | | | |
|-----|-----|---------------------------------|
| 130 | 王俊中 | 中古佛教醫學幾點論題芻議——
以「四大」和「病因說」為主 |
| 144 | 李永迪 | 談山彪鎮一號墓出土的一件銅鑑及其相關問題 |

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



圖一 乾隆內府輿圖·台灣部份（此為襲康熙測繪之地圖）

杜正勝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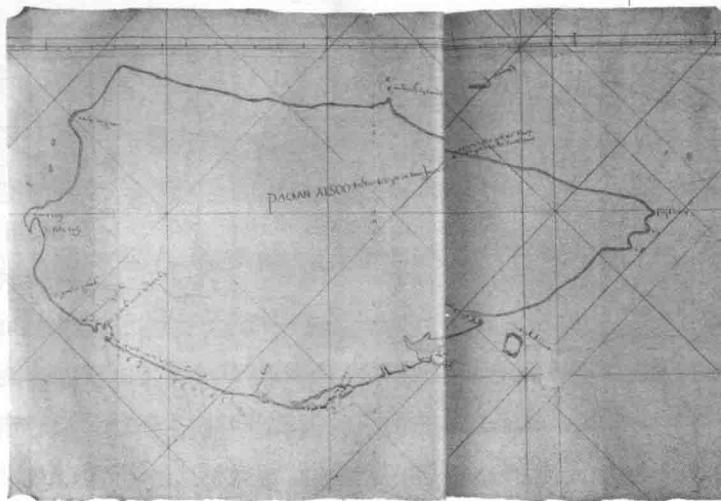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一幅清乾隆臺灣古地圖長卷，長666公分，高48公分。右起於沙碼磯頭，左止於雞籠山與雞籠仔，即臺灣從南到北的西半部（圖一）。此圖開卷題詞有云「圖內民番界址」，故定名「臺灣民番界址圖」。

這是所謂的山水地圖。此類長卷的臺灣山水地圖，今日臺灣所存者，尙有多卷，幾年前在史語所共同展出，有的詳記深山原住民聚落（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有的描繪平埔原住民風俗產業（如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而標識深山原住民與平地漢人或漢化平埔族之界域者，則為本卷的一大特色。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示我一種類似本卷地圖的幻燈片，只見臺灣縣和諸羅縣交界以南的部分，據說原件藏於莫斯科。經過初步比對，莫斯科卷開篇題詞與本卷大致相同，但只說「圖內界址」云云，不如本卷之正式，有可能是本卷的另一繪本。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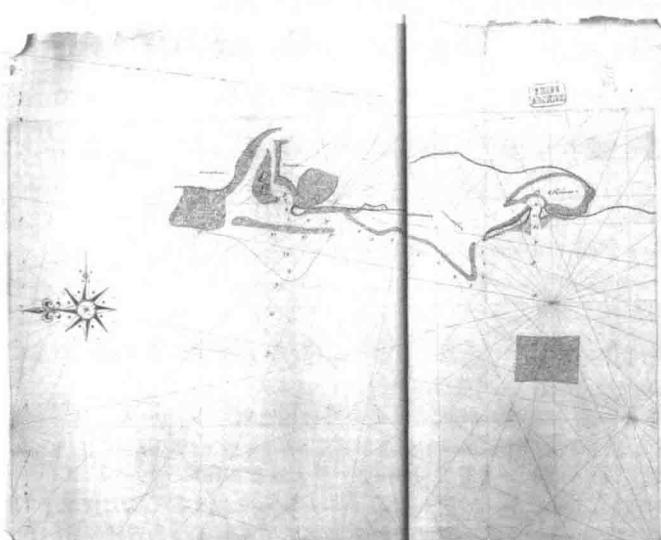
臺灣之有比較正確的地圖，可能推始於荷蘭人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在1625年製作的「北港圖」（PACKAN ALSOON；圖二）①，雖題「北港」，其實全臺輪廓形貌已經具體而微。此後西方人製作不少臺灣全部或部分地區的地圖，大抵皆有精準的經緯度，與中國傳統的里程地圖截然不同。

地圖之繪製要先實地履勘，這是一件大事，人力物力所費不貲，非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作後盾難以為功。事實上地圖也是統治者控制土地人口等資源、掌握國防戰略形勢的有效工具，所以製圖便成為國家的重大政務。基於此理，臺灣之有地圖當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始（圖三、圖四），而中國人之製作臺灣地圖亦當從明鄭政府才開始②。杜臻《粵閩巡視



圖二 北港圖（出自《漢聲雜誌》105期，圖版6）

紀略》卷六〈附紀臺灣澎湖〉曰：鄭克塽降清，「盡籍其境，土數千里，戶口數百萬，為圖以獻。」此圖當是明鄭統治臺灣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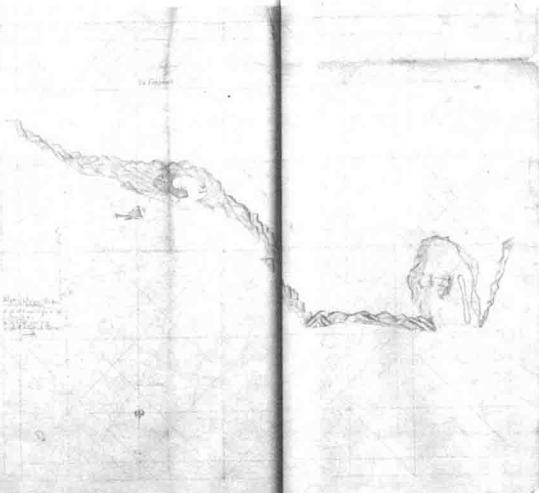
圖三 大員海港圖（出自《漢聲雜誌》105期，圖版5）

① 《漢聲》105，《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圖版6。

②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著〉著錄沈光文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莊吉發教授推定這是中國人最早繪製的臺灣地圖，恐不正確。沈書即是圖考，當是據政府勘測的地圖所作的文字考證，不能稱作地圖。事實上沈氏以一介布衣，飄流來臺，不可能獨力完成臺灣輿圖。莊說見《故宮臺灣史料概述》，頁1。

間繪製的，進獻後應該存於清宮內府，今未之見。

杜臻奉命巡視粵閩，畫定疆理是在清朝征服臺灣那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至翌年五月，《四庫提要》說，他未親履臺灣，只據咨訪所得者錄之。杜臻官拜工部尙書不一定有機會看過鄭克塽進獻的地圖，不過據他說施琅「身自渡海，行定新附地，絕域盡入版圖矣」，則他「按圖」而述的聚落、景觀和里程等資料，很可能是施琅所畫的地圖^③。四庫全書本的《紀略》附有粵閩「沿海總圖」，沒有臺灣圖，所以施琅的臺灣圖怎麼畫法，也不得而知。



圖四 雞籠海岸海圖（出自《漢聲雜誌》105期，圖版 11）

清朝統治臺灣，因應不同的需要，多次勘繪臺灣輿圖。史語所藏卷據施添福教授考證^④，當係乾隆二十五年（1760）閩浙總督楊廷璋「清釐臺屬邊界」時所繪製。其說可從，茲不贅述。按早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耶穌會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馮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和德瑪諾（Romain Hinderer）三人銜命來臺繪製輿圖，經方豪院士考證^⑤，這是有經緯度的臺灣圖，和雲貴諸圖一樣，丈量踏繪，其法之精，在中國

是從古未有的（參考圖一，見第二頁）。但這種精準的製圖技術，今日所見的諸本清代臺灣輿圖都沒發生影響，本卷雖然上距馮秉正的勘繪將近半個世紀，依然是傳統的山水地圖，即是明證，臺灣各種方志的輿圖也無例外。

4

不過中國傳統地圖重視實用，以備治理之需。本卷除標識府縣官署所在的城邑外，沿海與內陸兵丁駐紮營地比其他諸卷山水地圖都較為詳細。兵營稱「汛」或「塘」。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1807）卷四〈軍志〉汛塘條解釋說：「設弁帶兵曰汛，僅安兵者曰塘，城內置兵宿守者曰堆。」汛與塘之區別在於有沒有軍曹。然而本圖瀨口塘（大約今日臺南市鹽埕一帶）旁注：「把總一員，安兵四十名」，軍官駐守也稱作塘。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詳列番社名稱的臺灣地圖，據考亦製於乾隆中期，與本卷相近^⑥，其中有許多汛都只置兵丁而已，沒有設軍曹^⑦。

③ 詳參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六，四庫全書本，頁460-1121以下。田中克己以杜臻所述即是明鄭的臺灣輿圖，恐不確。田中之文見陳乃草譯〈鄭氏之臺灣地圖〉，《臺灣風物》6:1，1955。

④ 施添福，〈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台灣番界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1991.6。

⑤ 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

⑥ 莊吉發，〈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收入《故宮臺灣史料概述》，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⑦ 如大湖街汛防，安兵五路；半路竹汛防，安兵五名；芊蓁林汛，安兵五名；二濫汛，安兵五名。以上四汛在今高雄縣湖內至岡山之間。中部方面，臺仔窟汛、海豐港汛、貓兒干汛、三林汛、二林汛、馬芝遶汛，皆只安兵五名，以上在今雲林縣和彰化縣境。

較早的《諸羅縣志》(1717)卷七〈兵防志〉，汛對塘並無直接的統轄關係，目加溜灣、麻豆、新港、鳶松、府治五塘之地即鎮標之汛地，而諸羅縣的一汛二塘俱屬隨防千把總兼轄，斗六門的五汛四塘俱屬斗六門把總兼轄，半線二汛四塘、下加冬三汛四塘等亦然。本圖的汛塘當近於康熙朝的制度，與十九世紀如《彰化縣志》(1832)的燕霧汛管帶七塘(卷七〈兵防志〉)之階層制不同。



圖五

本圖西螺塘、二林塘、三林塘、番仔控塘、大安塘、鹿仔鹿汛、沙鹿塘和牛罵塘附近都畫有☰，形似三顆子彈並列（圖五）。此一標識南部北部的汛塘皆未見，而且只見於沿海的塘。上舉國立故宮博物院詳載番社社名的輿圖也有此符號，見於竹塹城西方的海口汛、中部的水裡汛和鹿仔港汛炮臺，亦在沿海地帶。這兩卷輿圖的「子彈」形標識代表什麼？查《諸羅縣志》〈兵防志〉水師防汛條云：「各港汛並設砲臺、煙墩、望高樓，以防意外之警。」推測這三顆「子彈」應該就是砲臺、煙墩和望高樓，屬於海防之設備。

5

* * *

本圖相較於他種地圖，其史料價值之可貴者在於山前地帶從南到北所畫的紅色和藍色線，即題記所稱的「民番界址」。這是臺灣開發史極其珍貴的史料，也是漢人移殖者侵略原住民的具體見證。題記說：

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定界。臺、鳳、諸三屬用紅線，源其舊也。淡防屬向無通身畫界，只山口設碑耳，今依新定界，用藍線。彰屬則于舊界之外，間置新界，故紅藍線並用。（莫斯科卷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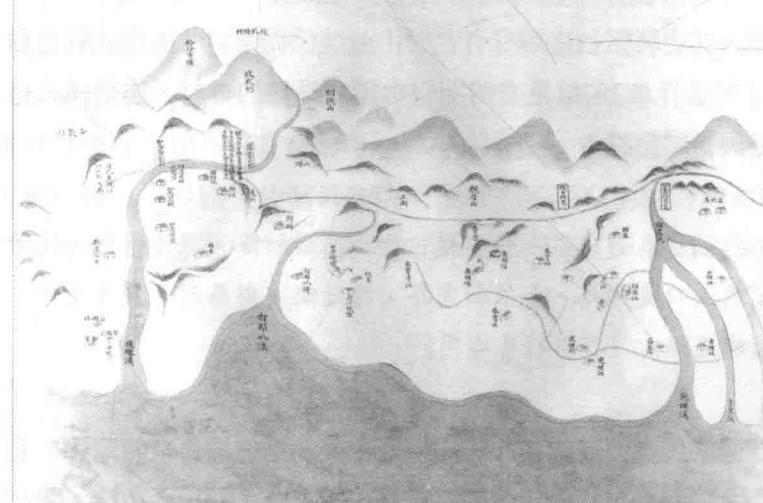
南部鳳山、臺灣、諸羅三縣的民番分界線在此圖採用紅色線，是依據舊有的定界。北部淡防廳，以前只在山口立碑為界，1760年的勘察定界，在本圖上採用藍色線。中部彰化縣則舊界和新界並存，故這一帶有紅藍兩色線。

彰化縣境紅藍二線並存，有些地段兩色線重疊，有些地段分開，後者必然是紅色線近西部平原，藍色線近東部山區，這是漢人墾拓最好的例證（圖六）。茲舉兩色線分開的一段來說明。北渡濁水溪，從八

娘坑經二重埔、頭重埔、牛留厝、茄苳腳、牛吃水庄、南投庄、陳山庄，渡大肚溪，經外凹庄到圳頭坑隘，這一條線是舊有的民番界線，線以東的土地屬於原住民，漢人不得越界開墾。然而當1760年勘察時，界東已有漢人經營的瓦窯，還有十數個村落，官府只好承認既存的事實，再在東邊近山的地方畫界，這就是藍線的新界。

長條連綿的界線確立之前，只在山口設隘把守，防止原住民出入平原地帶，同時也不准漢人進入近山地區。隘通常搭蓋茅草屋舍，以供隘丁居住，謂之隘寮⑧。本圖北部屬於今日苗栗縣的南湖隘、貓理隘、加志關隘、尖山隘寮皆是。1760年定界時所畫的藍線，往往越過原來隘寮之外，和中部的情形一樣，同是漢人越界墾拓的見證。

（圖七）



圖七

回過頭來看看南部，本圖題記明言「紅線源其舊」，參證中北部的情況，這條紅線是不能說明1760年時南部漢人與原住民分佈的真實情況的；

⑧ 唐贊哀，《臺陽見聞錄》（1887）卷下〈防務〉隘條，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換句話說，在漢人墾殖較早的臺灣南部，所謂民番界址當遠遠在此線之東。那麼本圖紅線上的某某界（如姜埔林生番界）或界碑（如中坑生番界碑）也應該只是表示舊址而已，而非十八世紀中葉的實情。

* * *

本圖從南到北的民番界線即臺灣史籍上有名的「土牛紅線」，我贊同伊能嘉矩先有隘後有土牛紅線的說法⑨。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說：

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紅線爲界，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闢，耕民或踰土牛十里至數十里不等，紅線已無蹤跡，非設隘以守，則生番不免滋擾。（卷三建置志）

這是比較晚期漢人越過土牛紅線，在新墾殖地向內山推移再設置的隘寮，是對原住民更進一步的侵略，不是先有土牛紅線才有隘寮也。

所謂「土牛紅線」，據伊能嘉矩說，早在明鄭創立屯田制之時就有土牛及紅線之稱⑩。此一論斷我現在還找不到證據，也不敢說本圖紅線「源其舊」的舊，是否可以追溯到將近一百年前的明鄭。伊能氏解釋紅線乃疊磚爲牆，如紅色之帶，施添福教授已辨其非⑪，當時連官衙所在的縣城都只是土城牆，沒有磚城牆，荒埔邊界何來這麼多磚？單以本圖題記來看，紅色標示早期的定界，藍色標識1760年新定界，足以證明「紅線」是當時官方勘繪界圖的體例，和紅磚完全無關。又因為紅色線最早，故以「紅線」表示漢人與原住民的分界，不是所有的分界只畫紅線而已。

至於「土牛」，伊能氏認爲堆土積而爲壘，其外形如臥牛，這種看法施教授無辨，並且接受。然而所堆的土是挖溝而來的，故有「土牛溝」之稱。既然是溝，而且長得可以作爲行政區的邊界⑫，便不可能是牛形的土壘，所以「臥牛」云云也和紅線一樣，同是望文而生之義。

考察本圖，濁水溪到虎仔坑一段的說明云：

八娘坑北坑爲界

此處以山根爲界

此虎排溝築土牛透連虎坑爲界

這些文字反映一個史實，所謂勘察定界多是利用天然的山河或坑谷，作爲區隔漢

⑨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頁785，東京，刀江書院，1928。

⑩ 同註⑨。

⑪ 施添福，〈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劄記（一）：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2，1989。

⑫ 《新竹縣採訪冊》卷一〈總括〉竹北堡云：北以土牛溝與淡水縣桃澗堡分界。

人與原住民的界線，在沒有天然險阻的地方，才挖溝築土堆。這種定疆界的辦法，早在西元前九世紀西周晚期散氏盤銘文記載的國界就這樣了，築土堆，當時稱作「封」。中國古代國家的國界大概多是採用這種形式¹³，1760年閩浙總督楊廷璋條奏本圖的定界也是用這種辦法，他說：

今據該鎮、道勘明，於車路旱溝之外，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接處，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為界。至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燄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沒之隘口立石為表，餘亦未經劃清。今酌量地處險要，即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¹⁴

本圖竹塹城之北犁頭山界有注文云：「自此山至南腳下至員山仔，長八里，照丈一千四百四十丈，應挑滿埔土牛。」即從犁頭山腳至員山仔的平埔地築了1440丈的「土牛」，這是因為無天然險阻，遂堆土為界。築土堆的土是挖溝得來的，故曰「挑挖深溝，堆築土牛」，或「挑溝堆土」，因此既有「土牛」，必有「土牛溝」。

這段1440丈長的土堆，應像一道隄防，即如中國古代的「封」。西周散氏盤的「封」可能近似臺灣的土牛，而戰國時代的《管子》〈度地〉篇則稱作「土闢」。唐人尹知章注云，「闢謂隍」。闢本來是高高的門，何以說是像護城河的隍呢？道理即出在土牛與土牛溝的互生關係，「挑溝堆土」，即一邊是高土堆，一邊是深溝，《管子》「土闢」的名稱也正可說明是類似於土牛和土牛溝的工程。

土牛和土闢雖然同一個道理，但「土牛」是農民的生動語言，其名恐怕和古典的「土闢」無關。然而為何長土隄而以「牛」為名，我不敢妄測。記得小時候舊式碾米機具名作「土人」，碾米房稱作「土人間」。碾米機具既然不是人形，卻可稱作「土人」所以「土牛」也不必與「臥牛」之形糾纏在一起。（圖八）

¹³ 參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頁584-585，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2。

¹⁴ 《清高宗實錄選輯》卷一，乾隆二十五年，此利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資料庫。

【附記】

兩年前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與史語所訂定合同出版本卷「臺灣民番界址圖」，那時我擔任所長，完成簽約手續；不久我別有任務，這件出版合同也淡忘了。魏先生熱愛臺灣，凡對認識臺灣有益的事他都會努力不懈，投資出版，不計較成本。經過他的努力，這卷地圖終於要出版了，他仍然希望我接續前約，為這卷地圖寫一序文。固辭不獲，乃展卷重讀，不期然地寫下一些淺見，以續時賢之貽末，敬請海內外專家指正。

九十一年五月七日凌晨寫于史語所



圖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立前的景觀（郭秀霞女士提供）

土人間
農家

Aviskrift.

Dr. J.G. Andersson

Tai Tsao-chung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TURKISH

Förslag den 1. sept. 1921.

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

Till Hans Kunglig Höghet kronprinsen,

Stockholm.

Edors (ung), Hognat,

Under konfidentialt form har överintendenten Ljungblad
meddelat mig, att äldre kungl. v. s. har eventuellt nu för avsikt att
i en sista framtid besöka Kina och att detta sannu ej är riktigt, in-
nivida Frs Höghat kan förläggas till frigöra sig, från sina
plikter i Sverige, och därmed återvända till Europa eftersom
er endast på ett litet område.

1935年6月，安特生在甘肅和政縣邊家溝發掘到的彩陶，這時他以為甘肅的彩陶遺址年代比河南早，後來他才覺悟，事實正相反。

馬思中(Magnus Fiskejö)

瑞典東方博物館

陳星燦

北京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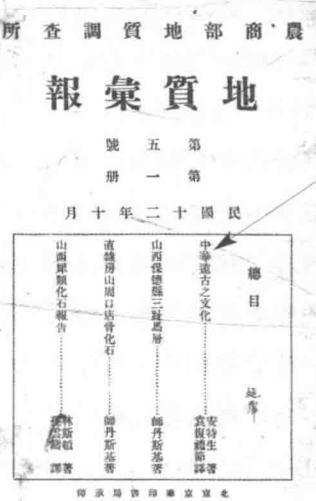
古今

論衡

安特生 (J.G Andersson, 1874-1960) 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重要開拓者。作為仰韶文化的發現人，他在瑞典以Kina Gunnar的名字被人熟知①。仰韶文化的發現，也被視為「劃時代的發現」，而加載史冊②。實際上，關於安特生在中國從事地質、考古活動和對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及考古學的貢獻，一直都是中外學術界關心的話題③。2001年9月下旬，我們在瑞典東方博物館發現了一封1921年9月4日安特生從北京寄給瑞典國皇太子(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的一封長信，對於理解安特生豐富的内心世界，卓有幫助；對於近代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翻譯如下，併略做考釋④。

編者按，安特生寄出本文披露的信後，於10月赴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掘。仰韶遺址是中國境內發現的第一個史前村落遺址。安特生於1923年以英文發表〈中華遠古文化〉，正式將「仰韶文化」介紹給世人。

此篇以上為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文友會講演之稿。彼時予以為石銅時代東西有交通之証。可供參考者，惟賴施密特及本拍利二氏之作。嗣余欲與諸考古學家解決此重要問題，乃將第十三版圖及陶器數片，送瑞典國皇太子殿下鑒定。殿下固精於考古學者，五月間復往遊倫敦，更與英國博物院諸專



編者按，關於仰韶文化之來歷，安特生最初認為：仰韶彩陶與歐洲、中東的某些彩陶，「器工花紋皆有極似之點……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但是他在篇末注明，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求證，瑞典皇太子是他求助的專家之一。

① Niall J. Mateer and Spencer G. Lucas, Swedish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in China:a history of the Laterlius Collectio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Uppsala, New Series, Vol. 11, pp. 1-29, 1985。所謂Kina Gunnar就是「中國的古納」的意思，Gunnar是安特生的中間名字，他的全名是Johan Gunnar Andersson。

② Bernhard Karlgren, Johan Gunnar Andersson in Memoriam, The Buttel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3, p.V, 1961。高本漢在此文中稱仰韶文化的發現為「an epoch-marking find」，即「開紀元」或「劃時代」的發現。

③ 參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史研究（1895-194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7; Mateer and Lucas, 1985。

④ 此信原藏東方博物館，注明是抄件，但有安特生的親筆簽名。安氏給別人的信件，大都有抄件，而且基本都是打印而成，即使在甘肅考古期間也不例外。原件系瑞典文，由馬思中譯成英文，陳星燦將之轉譯為中文。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東方博物館是該館正式的中文名字，它的瑞典名字是「Ostasiatiska Museet」，即「東亞博物館」，英文名字是「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即我們熟知的「遠東古物博物館」，在此我們使用該館的中文名字。該館的中文館名見於中英文對照的「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即《東方博物館介紹》一書的封後（斯德哥爾摩，1971）。

J.G安特生博士

大草廠

北京

北京，1921年9月4日

皇太子殿下

斯德哥爾摩

尊敬的殿下：

拉格里奧斯會長很有信心地告訴我殿下可能有意在不久的將來訪問中國。但是殿下能否離開瑞典這麼長的日子還說不定，這個計劃因此逐在初擬之中。

我認為殿下應該到這個您付諸精力研究的國家看看，這個念頭揮之不去，有好幾次我都很嚴肅地考慮過向您直接稟報我的建議。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認識到這樣的做法也許有失尊敬。現在，當我知道這個事情已經提上日程，使我難奈心中的喜悅。

我不敢冒昧猜度殿下訪問中國對殿下本人的可能意義，因為我對殿下的訪問計劃和日程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另一方面，請允許我談一點這樣一次訪問對瑞典和中國的意義。

對於我們瑞典的聲譽來說，毫無疑問，殿下的訪問必是非常愉快而又富有成果的保證。據我看來，相信這也是事實，我們的對華貿易很少，與這個巨大的潛在市場事實上所應該得到的很難相稱。瑞典對日本和中國感覺興趣的程度，很難通過我國在這裏的投入得以體現。瑞典是斯堪地納維亞最大的國家，卻是在北京唯一沒有長設領事的國家，而同時瑞典又是三個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唯一在首都駐有中國領事的國家。和中國人談論這個事情很讓人不自在，因為他們可能不全理解，他們甚至會認為這是對中國的藐視，因此這對我國的利益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殿下的來訪必將增進中國人對在華瑞典人的友誼，瑞典對中國感覺興趣這一事實也必將因此得到更深入的理解。無論訪問採取什麼形式，必將引起萬眾矚目。因為中國政治上的積弱，中國人對於任何被放在第二等位置的做法都非常敏感，因此這樣一次高規格的訪問，必將引起對中國的深切關注，而不會以任何方式冷落了任何其它國家。

這是從瑞典方面獲得利益的角度來考慮的。說到中國，我認為它應該得到更多，在這個方面我願意略陳私見。

我想殿下在華訪問期間，可能不願被人當成旅行的顯貴或者觀光的遊客，可能更願意被視為英國人所尊稱的學者(Scholar)，更願意是一個帶著同情心和興趣來探索這個綿延數千年之久的奇妙的中國文化的發展軌跡的學問家。因此，我相信殿下來訪肩負著一次偉大的和倍受歡迎的文化使命。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相信殿下也會像在國內一樣準備親自動手參加這裏的田野工作。事實是，中國腐朽的官僚制度鄙視上層階級的成員參加任何體力勞動。我們遇到了這樣的困難，但是我們已經為中國政府培養出一群年輕的地質學者，他們把親自動手參加野外作業視為平常。

現在，如果像殿下這樣無尚尊寵的人，來到這裏謙虛地蹲在考古遺址，手執小鏟，那對展示科學的神聖性將發揮巨大的道德作用，即使採取了這樣一種屈尊的形式。

在這個不幸的、被貪婪愚蠢的軍閥的無意義的爭鬥弄得四分五裂貧困潦倒的國家，對科學研究的一點點興趣，儘管可以按照西方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加以引導和組織，但還在起步階段。

毫無疑問，不同類型的中國學者都會高興和您見面並與您交換意見和經驗。我堅信，也向您保證，這樣的交流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就鼓勵中國人開展科學研究而言。無疑還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還有，所有熱愛古代中國文化的人，都對目前這個國家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保護的狀態感到痛心疾首。從這個方面說，呼籲保護是必要的，已有一些外國人試圖在這個方面對中國人施加影響。

但是恐怕這些努力常常是不適當的或者對中國人竟是侮辱，因此我相信殿下的來訪，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都對推動中國文物的保護有極重要的價值。

我請求您寬恕我在此提出上述建議。如果殿下認為這些建議還有任何可取的地方，懇請您允許我與您再次聯繫，當然，即便在殿下離開瑞典之前，如果需要為我斗膽在這裏提出的文化使命作準備的某些資料，我將會非常榮幸。

至於訪問的時間，據拉格里奧斯說，我理解也許在中國會停留幾個月。從這個方面考慮，有必要向您說明這裏最好的工作季節是秋天，因此八月到來也許最為適宜。

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將非常高興追隨左右以便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無足輕重的服務。因為我的聽力受損，我不能夠說中文，通常與人交流也有一定困難，所以我也許不能有很多幫助。但是，我將高興調整我自己的旅行計劃，以便能夠追隨左右。我也許可以把科學上卓有造詣的年輕的中國知識精英引見給殿下。

當然，在殿下來訪期間，卡爾貝克工程師如果能在中國最為相宜，因為就殿下的興趣而言，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敬禮

安特生